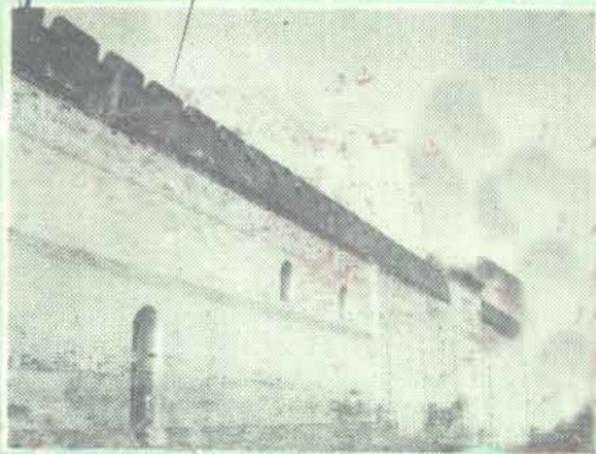


257.05

# 大荔县文史资料 粹



(第四辑)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省大荔县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

# 大荔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大荔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目 录

1. 同州皮货业的兴衰 ..... 刘启嗣 (1)
2. 同州皮货行中民国年间的一次劳资斗争 ..... 王重九 (9)
3. 我县历史上的产盐基地——盐池洼 ..... 王勤生 胥静波 (11)
4. 我对盐滩的回忆 ..... 孙尔文 (24)
5. 对盐池洼几个盐场的回忆 ..... 李葆山 (30)
6. 原朝邑县近代商业略述 ..... 张富明 (32)
7. 我县民国年间的粮食集市 ..... (36)
8. 大荔巨商赵松泉家的发  
展始末 ..... 李志斌 (44)  
附：大荔城内的赵家庄园 ..... (51)
9. 家庭史话 ..... 张仰惠 (55)
10. 兰州水烟与同朝人 ..... (62)
11. 安仁镇的胶坊巷 ..... 魏 平 (73)
12. 朝邑风匣小议 ..... 张晓林 (76)

- 13. 大荔著名土特产“108” ..... 潘志华 (79)
- 14. 同州西瓜 ..... (89)
- 15. 同州西瓜大如斗 ..... 曹 涛 (92)
- 16. 大荔的地方名菜与风味小吃 ..... (97)
- 17. 浅谈大荔的传统 小吃 ..... 畅效康 (105)
- 18. 大荔矿泉水和洛北  
    改水工程 ..... 王宏刚、马建民 (108)  
    附：矿泉水技术鉴定书 ..... (113)
- 19. 神奇的矿泉水 ..... 罗 丁 (116)
- 20. 征稿启事 ..... (122)

**封面照片：丰图义仓外墙**

# 同州皮货的兴衰

刘启明

大荔古为同州府治，皮毛业极盛。硝制的皮货较之他处所制者独具特色，自古就久负盛名。据《元和志》载，远在盛唐开元年间即已成为地方官的进上贡品。清道光三十年（1850），大荔知事熊兆麟所纂的《大荔县志》也有“县西羌白镇为皮货所萃，每岁春夏之交万贾云集”，“陕西巡抚岁以珠毛羔皮八百张贡诸京师”的记载。旧志和史料上的“关中皮货”、“西口货”都是对“同州皮货”的赞誉。

“同州皮货大宗是长袍、马褂、旗袍、女袄等服饰品，销路极广。除供本省外，“行銷全国，远销海外”（主要是英国、土耳其），年加工毛皮约用皮百十万张（长袍每件用皮七

张，马褂每件用皮四张）。平、津、沪及长江流域各大城市都列为紧俏货。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刊行的《陕西实业考察》中记载：

“同州为陕西皮毛之集中地，~~以~~皮货闻名全国”。“输出皮货多递邮包寄出”。所谓邮包并非上捆包扎，布皮包裹，而是象今天医用布那样的纸筒包装。即此足见其珍贵。

号称“同州皮货”，其实同州并不产皮毛。皮毛原料来自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四川（兔皮）及本省长武等地，运至大荔，硝制而成。

“同州皮货”板薄、毛柔、色泽白、毛根软。用口轻吹，毛能从根到梢随气游动，手提板子摇晃，毛能从根到梢反向松倒。毛通身（梢到根）呈多道环状，最佳者称九道环。此种环状经久不会消失。譬如板子陈旧得不能再用，而原有的几道环状依然不变。

“同州皮货”所以能具有这些特点，固然与选料硝制浸洗晾晒等一系列工艺有密切关系，然“水性关系”是个独特的因素。“惟同州硝水泡熟者，则较他处所制者格外轻，软，

柔、鲜。”（自《大荔县旧志存稿》）据在大荔、甘肃靖远干过十多年皮毛业的老师傅回忆，同一张皮在大荔和在甘肃泡制加工，其质量迥然不同。其原因主要是甘肃泡皮用黄河水，大荔用的是碱井水。显然是大荔的水质量具有含硝及其它矿物质成份，有利于泡洗皮张。另外，泡洗的添加剂，甘肃用奶，大荔用糜子粉、皂荚和硝。曝晒时，甘肃采用软办法（即将泡制好的皮张用水洒湿拉展就地晾晒），大荔采用硬板法，即将泡洗好的皮张，四周拉展钉在晒板上晾晒，皮是展的，毛根自然松散。两相比较，大荔出的皮货显得特别薄、柔、色白、毛根软。甘肃出的皮货就显得板子厚，欠柔性，毛根硬、色发青，份量重。同时，大荔的传统加工工艺也特别精细，一件皮筒子虽然由好几张皮拼成，但由于在选料、裁剪、缝制等环节上的考究，因而在毛色、毛长、毛绒及弥合缝隙上，分辨不出是拼凑的，整件成品如同一张毛皮。

我县昔日的皮业规模相当可观。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陕西实业考察团考察：同

州皮货在最盛时，全城有硝皮作坊一百余家。据有关知情人追忆其先祖的讲述，同州皮货业最盛时，大户有工人一百五十余人，一般的也有六七十人，全行业工人约在万人左右，相当于当时大荔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成为一支庞大的行业队伍。远在皮业同业公会成立以前，很早就设有“毛毛匠会馆”（系劳方组织），和“皮毛业会馆”（系资方组织），有常设理事和聚会制度。这一百多家作坊，棋布在城内各个街巷和城周围的南、北婆合、东、西长城、埝城、谷多、荣华、城南、许庄、西小坡、户家、杨家、埝头等好多村庄。作坊工人大都是来自大荔城乡的剩余闲散劳力，也有韩、澄、郃、蒲、渭、临潼等县的手艺人。

皮毛业乃“一货而工商兼蓄”的行业。进口生皮原料和出口筒子熟皮乃商业；硝泡和裁制乃工业。工商业齐发展，大大活跃了地方经济。清末民初，是同州皮货业最为兴盛时期。其中规模较大的作坊有李仰山的“祥盛李”，张绥堂的“惟一正”、葛佐臣的“仁义荣”等六七十家，都是洋货生意，产品远销国外。资

金最多的5000元（大洋、下同），最少的也有两千元的本钱。一般年份，中小型作坊年进生皮约千张以上，大字号年进生皮约七八千张到一万张，全县总计每年采回生皮百万张左右，价值约200万元。当时，同州城内经常住有沪、苏、杭、汉口、广东等地的客商，收购硝制好的羊、兔皮及大货（银针、灰鼠、猞猁、獭皮，貂皮等贵重皮张称大货）。各种皮货出口价值约500万元，另外乡间还有一批家庭作坊，专门收购硝皮作坊剪下来的下脚料，利用农闲时节，男女老少齐动手，将大如手掌，小到寸余的碎皮，加工成各样低档皮货，就地销售，从中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这一商品生产的发展，钱庄也应运而生。官营的有商务会办的“同济钱庄”。私营的有“志成宏”、“集顺德”等二十余家。

这么好皮毛行业到民国二十四年（1931）仅剩十几家作坊，随后日渐衰败，以至消亡。其主要原因是：

一、出口受阻的挫伤。作坊的实际流动资金和向上登记的是两码事。大作坊年进生皮七

八千张，需要一万五六千元，而自有资金只有几千元，大部分是向经营出口的沪商预借，按规定预借款有息，上海交货价按行市而定，预付款的本息从货款中扣除。民国十九年（1930年）货运到上海，因出口偶然受阻，出口商拒绝按原议规格收货，为了照顾多年的老关系，遂按国内市场需要，由各作坊抽调技工到上海另行裁剪加工。这样大料裁小袄，不仅材料损失严重，在价格和再加工的费用上都受到巨大的损失，因此亏损过大。“同州皮货”遭此打击，元气大伤，资金薄弱的商行，因此一蹶不振而宣告倒闭。

二、兵劫战祸的摧残。民国初年战乱不已，民不聊生。“麻振武（外号麻老九）占据以来（麻是民国十三年（1924）驻防大荔的）生意歇业者三分之二”，“盖由麻数年以来，不时苛派大宗款项以致元气大伤”（自民国十七年《陕行汇刊》一卷一期）。加之民国十六年（1927）“刘军（刘汝明部）攻破城后，搜查麻老九余孽，公开放抢，使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甚巨”，数百年之储蓄于此尽耗矣（据大荔县旧志存稿）。

商界金融，顿告破产。“一时欲求恢复，殊属不易”（《陕西实业考察》）。

三、自然灾害的打击。民国十七年（1928）大旱，极热。夏欠收，秋未种，生病中暑者比比皆是。民国十八年（1929）大旱，冬大雪，极寒。积雪没胫，坚冰在须。民国十九年（1930）蝗虫灾，动则遮天蔽日，过则禾稼一空。民国二十一年（1932）烈性传染病“虎列拉”流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刮狂风，下黑霜；这些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迫使人们挣扎在饥饿线上，粮价一再暴涨；哪个作坊产业主能供给起众多工人最起码的食需！

四、币制管理的影响。“自废两改元及币制管理的政策实行后，皮毛业销售……已减。以致各行业均受打击”（民国二十四年《陕行汇刊》第七期）。当时以废两改元、发行纸币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政策，虽是势在必行，但因连年战乱，你来他往，群众对币改政策不予以信任，对投资经营皮业也有很大影响。

五、厘税苛重。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续编《中国经济年鉴》载：“外地皮货所以不

能运陕，究其缘由，则因此项皮毛货物，由宁、青、绥、甘运入陕境，起落厘税，按照旧秤（指老十六两秤）重量计算，每斤（指裘衣筒子）征税八角；改以新秤（指新十六两秤）计征税一元之谱。另外，每元附加三成。因之，商贩裹足，皮货商遂有不能支持者”。

六、抗战军兴、交通滞塞，传统销路断绝，加之，大荔当时处于抗日前线边缘，常受日机空袭威胁，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有的皮毛商号遂被迫西迁甘肃平凉，靖远一带。从此，久负盛名的“同州皮货”行业，便销声匿迹了。

（此稿编辑整理时，综合了  
李志斌、李雅言同志的来稿）

# 同州皮货行业中 清末年间的劳资斗争

王 重 九

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大荔皮货业甚为发达，农村不少人迫于生计，纷纷进作坊当工人，不但工资菲薄，且时有失业断炊之虑。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起名“太平会”，其目的是团结工友，向资方要求提高待遇，保证安全，不能随便开除和借故扣减工资等。有一次工人们提出提高待遇时，资方大腹便便，因有官方为之撑腰，有恃无恐，不但不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更有甚于过去。工人不服，即举行罢工。资方不肯折威气，遂诬“太平会”为“太平天国”的余党，上告到同州府衙门（时官方则诬其为“长毛贼”）。官方虽多受贿赂，但慑于众怒难犯，推推拖拖上报到省，

省上闻之，大为震骇，马上派员到同州，会同大荔县衙门，抓走几名工人头目，连同资方代表数人，一齐到省。在审讯中，官方偏向资方，遂判工人代表以死罪，决定斩首。事已至此，作为资方的主要代表董养泉，却想的很多：既觉得严办了工人代表，取消了“太平会”组织，为资方出了气；又想到如果真正把工人代表杀了，工人会更加不服，拼命大闹，该如何收拾？特别是此后整个皮货业生意如何做，钱如何赚？个人生命，财产等如何保证安全？于是急中生智，当堂跪下反为工人代表求情。主要说，“太平会”只要求改善待遇，从无任何反清行动，恳求大老爷多多开恩，小民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这时当官也已吃饱了资方的贿赂，遂即顺水推舟、于形式上除申斥工人代表之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场官司，就这样告终了。回来之后，对工人们自然也作了一些妥协。

# 我县历史上的产盐基地

## ——盐池洼

王勤生 齐静波

### 历史沿革

盐池洼产盐历史，历代志乘均有记载。明正德《五泉志》云：“汉庄熊黑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使卤地诚得水，可令亩收十石”。 “唐贞观四年（621）唐太宗驾幸盐池”。 “朝邑幅员不及二百里，东有碱滩，西有盐池洼，南有沙苑，皆不可耕”。民国二十二年（1933）续《陕西通志》稿载：“朝邑盐滩东西长十里，南北宽二、三里不等，系古代一大盐沟，中隔黄河与山西潞村盐场遥遥相对”其地势与周围村庄比较相对下陷15米，比其周围地形垂直高差十五米，海拔高度比黄河滩还低。

盐池开发最早者见康熙《朝邑后志》云：“小盐池在县西北十五里。《唐书地理志》所谓小池有盐者也。今不恒有。明万历间，有以盐洼白於上者，行将征盐。令匝洼十八村看守，民甚苦之。邑人王河汀先生言於巡方获罢”，明确记述了明王朝万历年间，已有潮晒之盐形成，并将征收盐税。着令群众看守盐滩。清乾隆《钱志》载：“盐池洼产盐殊不多，且不时有。有以厘禁，妄敢采窯。人多采卤土汁，为之负贩百里外以糊口”。民国元年（1912）朝邑县知事刘芹圃、士绅张复初、张子甲、杨明甫等组织试办朝盐公司，集资本银六千一百五十两，开厂制盐，成效颇大。民国三年（1914）河东盐署因潞盐有被朝盐侵销之危险。经潞商呈请，派缉私兵一营，驻窑子头禁止制盐。后该公司无法支持。同众议决，遂于八月底停业。

民国二十一年（1932）陕西省建设厅长李仪祉先生，鉴于陕西省产盐区域稀少，食盐多仰给外省，倘有军事常遭盐荒，经调查朝邑盐区质量均佳，遂设官盐局，并取消采盐禁令。

以李仲符为局长，劝导人民尽量开发，并与陕西省银行商定合资，设立富秦盐厂。委任霍润生为厂长，规模既具，收效亦佳。

民国二十八年（1939），海盐潞盐各产盐区相继被日军侵占，西北食盐供不应求。遂提倡朝盐增产，兴筑盐仓，办理官收，对朝盐颇为重视。至民国三十一年，各界投资开池办盐厂者风起云涌，纵横棋布。原有晒厂数十家，后来晒熬并举，一跃增至一百五十四家，工人三千余人，其中较驰名者有：富秦、裕秦、秦丰、正大、大华、同生、光华、集中、农民、裕国、集德、秦东等盐厂。

## 盐滩建置

（一）盐务行政机构。民国二十一年设立陕西盐务督销局朝邑官盐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七月上交国民党中央政府。另设财政部陕西盐务局朝邑盐滩收税卡。民国二十六年（1937）改卡为处。设立财政部陕西朝邑盐滩管理处。处内分业务、会计两课。业务课下辖文牍，庶务、出纳、人事、官仓、盐工、滩务